

# 反右中一位香港人的迷惘

• 何光誠



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  
(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4)。

要寫就長達五十年的日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持之以恆之外，還需有相當值得記載下來的人和事才可做到。《陳君葆日記全集》(以下簡稱《日記全集》，引用只註卷數及頁碼)煌煌七大卷，字數二百餘萬，包含陳君葆由1932至1982年首尾共五十一年日記，但目前刊行的《日記全集》是經過大量編輯刪

節的。據陳君葆家人所述，其保留下來的日記達一百本，從1920年代起記載到陳氏去世的1982年，粗略估計有一千萬字。

陳君葆是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三鄉鎮人，幼年在鄉間私塾讀書，十一歲隨父親陳佩芝到港，曾在皇仁書院上學，1921年畢業於香港大學(以下簡稱港大)文學院，在大學唸書時曾見證五四運動在港大的一頁歷史。大學畢業後，他曾到過星馬從事教育工作，1931年回港，三年後到港大任職，歷任馮平山圖書館主任兼文學院教席，直到1956年才退休。

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陳君葆熱誠擁護新生政權，熱切期望祖國從戰火餘燼中復興過來；三年國共內戰結束，百廢待舉，但韓戰的爆發及一連串的政治、經濟改造運動接踵而來，中國人民自抗戰以來企盼已久的和平建設未得開展。留居香港的陳君葆，以其高級知識份子的背景及廣東省政協委員的身份，雖然沒有直接被捲入中國大陸的各種政治漩渦之中，但沉重的個人鬱結常常訴諸於日記的字裏行間，尤其是對反右前後的一段日子的記述，更顯出一個居港愛國人士的迷惘與徬徨。

陳君葆作為高級知識份子及廣東省政協委員，雖然沒有直接被捲入中國大陸的各種政治漩渦之中，但沉重的個人鬱結常常訴諸於日記，尤其是對反右前後的一段日子的記述，更顯出一個居港愛國人士的迷惘與徬徨。

陳君葆等人的〈聯名書面發言〉主張「長期的鳴」、「長期的放」和「放則不收」，因此他獲邀加入八大民主黨派之一的九三學社。未幾反右運動開始，他未必還有心情加入備受批判圍攻的民主黨派，況且民主黨派本身也自顧不暇，此事不了了之。

《日記全集》卷四包含了陳君葆在1957至1961年共五年的個人記錄，期間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以至民生各方面均面臨巨大的演變和衝擊，反右、大躍進、大煉鋼、人民公社、大饑荒等陸續發生。陳君葆和他的友人對這些重大事件都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不同程度的參與；他在反右運動中的心路歷程，正是現代中國的一個大轉折時代的側寫和縮影。

## 一 要「長期的鳴」、「長期的放」、「放則不收」

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總結發言，提到在藝術問題和學術問題上，要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當年夏天陳君葆與港大師生曾到北京訪問，獲周恩來總理接見；他在京參加了數場座談會，但仍不大理解中共提出「雙百」方針的用意何在，其實絕大多數非黨人士又何嘗弄清楚中共的意旨？他們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號召均未能好好認識。費孝通於1957年3月發表〈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一文，正好反映部分知識份子特別是高級知識份子的患得患失，對執政黨貫徹「百家爭鳴」的用意有所保留，「怕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這種人不能說太多，比較更多些的是怕出醜。」<sup>①</sup>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指導性講話，其後講稿經毛本人及中共若干人士作多次修

改，特別是隨着反右運動的升級而加重鬥爭論述，最後正式發表在6月19日的《人民日報》上。5月2日，陳君葆在廣東省政協第一次會議聽取傳達，報告人主要是複述毛澤東講話的一部分內容，在正式開會前陳君葆已從另外的渠道讀過該講話；次日的座談會熱烈地討論採用「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去解決性為人民內部矛盾的各種問題。兩天後，陳君葆草擬在政協會議上的發言稿（《日記全集》的編者略去此稿），5月6日，他放棄出席「黨與非黨的關係」的小組討論，專心寫好聯合發言稿交去大會秘書處，文稿其後由廣州《南方日報》發表，標題是〈聯名書面發言〉。直至6月上旬，陳君葆的一位在港友人告訴他，他才知道發言稿已公開發表了（卷四，頁57）。

5月10日，在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楊康華的講話中，陳君葆認為好幾點像是答覆由他擬就的聯合發言，當中包括發言稿所着重的「長期的鳴」和「長期的放」，並且是「放則不收」。13日陳回港，15日另一位廣東政協委員黃蔭普向他傳話，邀請他加入八大民主黨派之一的九三學社——一個成立於國共內戰時期、以高級知識份子為骨幹的小黨派。陳認為加入的好處是可以利用組織的身份回中國大陸做事，但他又以自己一把年紀、可供驅策的時間實在不多，以及想過讀書、寫文章的適意生活為理由，回覆說需要考慮一下才作決定（卷四，頁47）。未幾反右運動開始，他未必還有心情加入備受批判圍攻的民主黨派，況且各大民主黨派本身也自顧不暇，此事不了了之。

## 二 陳君葆的「鳴放」

1957年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統戰部在政協禮堂安排多次民主黨派人士座談會，由5月8日至5月15日已辦了六次座談會，各大民主黨派負責人大都發了言。5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報導當前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指出「對於黨外人士的錯誤的批評，特別是對右傾份子的言論，目前不要反駁，以便使他們暢所欲言。」次日，中共主席毛澤東開始寫〈事情正在起變化〉的中共內部傳閱文件，準備對右派份子進行清算。他指出在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一段時期之內要讓他們猖狂下去，興高采烈地走到頂點，直至物極必反為止。右派份子有如大批的魚浮到水面自動上釣，所以連釣魚的動作也可省掉；中共不須採取誘敵深入的戰略，已能「聚而殲之」②！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甚麼？〉的社論，正式向右派份子發動總攻擊，而毛澤東在當天及6月10日，分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的指示〉和〈關於反擊右派份子鬥爭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自投羅網的右派份子的悲慘命運已被決定下來。在5、6月間約一個多月的大鳴大放之後，人民內部矛盾急速轉化為對抗性的敵我矛盾，中國共產黨向右派份子作出還擊的力度令他們瞠目結舌，被殺個措手不及。

陳君葆亦如其他民主黨派人士般向中共提出了很多意見。5月20日，他接受駐港新華社記者訪問，內容詳細地記錄在當天的日記。他指出

當前的主要矛盾發生在「黨與非黨的關係」上，共產黨如何免除特殊地位的優越感，黨外人士如何祛除自卑感，關鍵在於共產黨能否「移樽就教，廣開言路」。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應要作出一系列的改善措施：設立制度接受意見；不要有天下是老子打下來的驕矜思想；不要搞形式主義；爭鳴拆牆，不怕指出缺點多，只怕文過飾非；黨員一旦抱有「鐵飯碗」的自固感覺，便有礙於真理的發展。陳更引述5月初在廣東政協會議上的聯合發言，主張「放」繼續放，長期放，「鳴」則盡情鳴，長期鳴。

此外，他還期盼執政黨展開批評，不流於形式主義；要廣開言路，獎勵鳴放，使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有接納批評言論的決心和雅量；力求民隱，揭露不平的事，鳴放不要曇花一現；消除畏縮傾向等等。他自言不是共產黨員，但服膺社會主義，認為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是中國的唯一希望。他的取態是「君子責己者重以周」，以責己之心來責中共，因為他愛共產黨猶如愛自己（卷四，頁48-49）。

倘若對照陳君葆與民主同盟的章伯鈞及九三學社的儲安平在同一時期的言論，在關於黨與非黨的關係、黨的作風、黨要拆牆求教非黨人士等問題上，可說是如出一轍。但反右風暴一起，民主黨派人士受到猛烈批判，被迫要交代其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他們被打成右派之後，除了被撤去政府及黨派職務之外，更要從公眾場合消失，就算日後有部分人摘帽，政治上已歸入另冊，失去諸般人身自由。居港的陳君葆，作為海外民主

陳君葆指出當前的主要矛盾發生在「黨與非黨的關係」上，期盼執政黨展開批評，不流於形式主義；要廣開言路，獎勵鳴放。他自言不是共產黨員，但服膺社會主義，認為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是中國的唯一希望。

人士有幸「隔岸觀火」，比他的眾多右派友人幸運得多，無須作出自我檢討及出席連場批判大會。先前共產黨作出「言者無罪」的承諾，已被現實的敵我矛盾、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殊死鬥爭所推翻，陳君葆難免為「以責己之心來責中共」徒嘆奈何。

### 三 不是右派的「右派」

反右風暴一起，民主黨派人士受到猛烈批判，被迫要交代其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罪行」。居港的陳君葆，作為海外民主人士，比他的眾多右派友人幸運得多，無須作出自我檢討及出席連場批判大會。

正當反右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1957年6月31日，陳君葆將寫成的《書感四首》詩作寄給友人陳彬和，詩前有序寄意，認為：

〔對國家根本大法〕尚存異見者，宜令早使盡所欲言，免為他日種下禍根，致生枝節，亦即毛主席「不贊成這些標準的人們仍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來辯論」之意。抑尤有進者，予以機會使「大放鳴」，則何者為香花，何者為毒草，反得易於暴露辨別，所以又有寧早毋遲，寧遲毋永使隱伏之義。（卷四，頁63-64）

似乎他對判別香花與毒草的標準全盤接受。儘管有很多被劃為右派的人發表意見的時候並未有敵我之想，以為協助共產黨整風、搞好黨群關係是與人為善的舉措，並以為自己所指出的諸般問題只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而已，那裏知道所提的意見會被上升到敵我矛盾的程度，以致紛紛墜入右派大網之中。

《書感四首》稍後以《感事四首兼寄彬老東京》為題，刊登在7月5日的港版《文匯報》上<sup>③</sup>，兩日後副刊編輯吳羊壁附上一群讀者來信，當

中指斥詩句「八年反側未云安」，以及「脫胎換骨談容易」，是等同於國內右派反動思想，抗拒思想改造。陳君葆認為有關指控是大大的誤解，辯說只是自己的造句不高明，以舊瓶裝新酒的方法入詩，導致因辭害意，造成誤會（卷四，頁67）。

早在7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由毛澤東撰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滬版《文匯報》已在中央黨報被公開點名批判，港版《文匯報》這時卻刊出陳君葆不合時宜的詩作，又怎不招來散播右派思想的嚴重指控呢？雖然國內反右進行得如火如荼，但香港的親中報章《大公報》及《文匯報》並沒有緊跟國內形勢。《日記全集》內找不到陳君葆參加過任何在港或在國內批判會的痕迹，看來以他的海外人士身份和身處香港這個特殊環境，還是有一點兒空間讓他避過引火焚身的厄運。

7月14日，數位港大同學詢問陳君葆關於北京整風運動和檢討思想的事，學生們也不禁對時局產生疑惑，可惜在當天的日記中，陳君葆沒有詳細記下他的回應，只點出中文學院學生陳世彬問及兩黨制的事，陳君葆認為中國無此需要（卷四，頁69），間接否定「輪流坐莊」的想法，承認及接受一黨專政的現實。一個月後又有港大同學往訪，詢問他對於反右派運動的看法，眾人一談就談了兩個多小時，可惜在《日記全集》中，發現不到陳君葆的看法。

7月下旬，陳君葆在廣州出席廣東省人大會議。他回憶起5月間出席省政協會議時曾讀過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

題〉。陳君葆認為斯大林以敵我矛盾的方法去處理南斯拉夫問題是錯誤的，將鐵托 (Josip B. Tito) 逼上梁山，結果導致社會主義陣營出現分裂。陳藉此暗喻執政黨把民主黨派人士打成右派亦犯了類似的錯誤，即誤把人民內部矛盾看作敵我之間的矛盾，以對付敵我矛盾的手段來對付內部矛盾，其後果「該是多麼危險！」(卷四，頁72)

臨近「十一」國慶，陳君葆感到心情複雜、苦悶，9月30日下午到告羅士打酒店參加新華社的國慶酒會，他「一連喝了多杯酒，也不曉得真的是歡喜呢，還是自己覺得另有一種心事！」(頁96) 次日的國慶日，他去金陵酒家開慶祝會，見到皇后大道西一帶自水街起布滿港英警察，嚴密戒備。會上他指出：「飲水思源！現在我既飲了水，也就思起源來。我想起這句深信不疑的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也不可能有新中國。」(頁98) 但當三天後他遇到知交廖恩德醫生，廖說自己和港大病理學教授侯寶璋在國慶節那天都沒有到金陵酒家去參加聚會，是因為不知如何應付反右鬥爭開展後的局面。故此，陳認為反右派運動事實上對香港的影響相當大，並察覺到那年掛起五星旗的地方也少了(卷四，頁99)。

#### 四 反右的迷惘

毛澤東在1957年11月到蘇聯作第二次訪問，17日毛會見留蘇的中國學生說：「整風是件大事。我們

要『認真』的改，……共產黨就最講認真。」陳君葆刻意節錄這段話在日記之中，認為毛的講話語重心長(卷四，頁118)。由共產黨黨內整風發展到反右運動，陳君葆事前估計不到形勢會急劇逆轉，但是不理解的東西也還得理解，正如他在國慶酒會講話中所稱，唯有對執政黨的偉大貢獻及毛主席的英明領導深信不疑。

踏入1958年，大躍進的發動又是另一個歷史大轉向。在3月29日至5月7日期間，陳君葆到湛江地區考察，親身察看城鄉建設的實況，旅途中他自定要做三件事：交心、自我批評、改造思想。對建國後國內外一連串的重大事件，陳君葆總結出不少看法，例如：未能深切體會「雙百」口號的涵義；未能深入了解「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意義，將鳴放與資本主義社會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混為一談，因此反右初起為之錯愕(卷四，頁170)。這些看法差不多全與執政共產黨的作為格格不入，陳君葆實際上已滑進反對派或促退派的一方，例如1955年開始推行的農業合作化，陳認為推行步伐過快，持類似意見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當年就被毛澤東批評為「小腳女人走路」④。

1958年，農村更加高速地向人民公社化的共產主義道路前進，陳君葆的思想明顯地落後於大躍進的形勢。他自稱是擁護社會主義革命的人，在1961年4月2日他記道：「『到民眾中去』，這是具有如此偉大的力量的幾個字！『革命是免不了有一些犧牲的』這是千古不磨的真

陳君葆認為斯大林以敵我矛盾的方法去處理南斯拉夫問題是錯誤的，藉此暗喻中國執政黨把民主黨派人士打成右派亦犯了類似的錯誤，誤把人民內部矛盾看作敵我之間的矛盾，其後果「該是多麼危險！」

陳君葆自稱是擁護社會主義革命的人，但面對反右時眾多師友所受到的嚴重衝擊，他的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常常不經意地流露出來，畢竟一個身處中國大陸之外的香港高級知識份子，很難發展出一套無產階級世界觀。

理！犧牲了小我，成全了大我，這種精神，這種氣概，要在革命實踐中鍛煉出來，才能得到它的不可動搖的基礎。」(卷四，頁543)但落實到具體的政治經濟環境，以及面對反右時眾多師友所受到的嚴重衝擊，他的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常常不經意地流露出來，畢竟一個身處中國大陸之外的香港高級知識份子，很難發展出一套無產階級世界觀，這是時代與環境帶來的局限。

1959年7月底，陳君葆與早年曾參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楊士端聊天，楊指出人民公社未免辦得過急，虛報邀功的人比比皆是。有人明知行不通卻不敢明言，唯恐招致反動落後的嫌疑。他認為大搞人民公社的失敗結局，可能與特務份子或敵人從中搗亂有關。究竟應否為失敗馬上作出糾正，還是只不過是一時的偏差無關宏旨，楊士端仍在探索之中，而陳君葆因夜深楊要回家，故此不能向楊多談他的看法(卷四，頁291)。事實上中共當時正在舉行廬山會議，原先要糾正大躍進的錯誤，卻一百八十度逆轉為反右傾鬥爭，把反映真實情況的國防部長彭德懷撤職罷官。大躍進的嚴重後果，造成1959至1961年持續三年的全國大饑荒。廣東地區的嚴峻災情，陳君葆在日記裏亦多有反映。

作為一個熱愛祖國的非黨人士，陳君葆面臨反右鬥爭的重大考驗，他當時寫下的日記提供了不少線索，有助後人了解一場影響深遠的政治運動的底蘊。陳君葆抱有一番愛國熱誠，一方面要緊跟國內形勢卻力不從心，許多時候只得響應號召，依執政黨的指示而行；另一

方面，他心中的想法不免要發乎內而形諸外，難免放出典型的右派言論，因而產生不少迷惘、惶惑以至鬱結。日記正是他道出某些獨特的個人感受，以及抒發有口難言之苦的渠道。

### 註釋

① 費孝通：〈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載《費孝通文集》，第七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頁32。另外，費孝通在1957年5月底接續前文發表〈「早春」前後〉，認為「黨和知識份子之間存在着的內部矛盾突出了。這種矛盾不及時解決，〔知識份子〕已經上升的積極性也就難於持久，有可能轉化為消極情緒。」見同書，頁86。但費孝通當時還未察覺到矛盾的性質已非人民內部而是轉化為敵我層面。

②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692。

③ 《文匯報》(香港版)，1957年7月5日，第6版。該四首詩是：

(1) 法立奚當異重輕，共存今猶不平鳴；如何休戚同關盡，尚有誰應領導爭？

(2) 鳴放翻教見肺肝，八年反側未云安；脫胎換骨談容易，思想根源到底難！

(3) 共企雄風致大同，坦途豈復夢能通？自由已謝唯心論，猶恐污泥礙鄧隆。

(4) 上智選教利令昏，薄嫌政出尚多門；何當細雨和風後，矛盾深深更挖根！

④ 千家駒：《千家駒自撰年譜》(出版地缺：出版者缺，1997)，頁151。

何光誠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博士候選人